

雪域佛教传入

内蒙古草原



## 迎佛的前奏

公元 1368 年元亡，蒙古汗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不久势力逐渐恢复，长期与明朝战争。自窝阔台汗时期，始与西藏建立的联系，这时基本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不会有多大势力，但也绝不是完全停止活动。蒙古地区所发现的文献证明，到了 1431 年（靴鞞阿货汗六年，明宣德六年）的时候，在北京还出版了畏吾儿体蒙文等四种文字合璧的陀罗尼经。这部经是属于西藏佛教密宗的。又据汉文史料，北元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于北元宣

光五年（1375年）曾南来归服明廷，以及明英宗年间（1436~1449年）西部蒙古瓦剌部中仍有西藏佛僧活动和他们的首领崇信佛教的记载。除此而外，我们在资料上是很难看到东部蒙古（明代汉籍所称的“鞑靼”）地区佛教僧侣如何活动的记载。看起来，在这一时期内，由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似乎没有传入蒙古地区。当然在这一段时期内，由于佛教在蒙古地区处于消沉，因而蒙古人原有的萨满教又复兴起来，则是一件没有疑问的事实。

众所周知，使西藏佛教再度传入蒙古社会的是格鲁派僧人。西藏佛教在蒙古地区再度兴起的历史，是由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1507~1582年）的西征藏土，才再次连系了蒙古与西藏的紧密关系，因而藏传佛教的一支——格鲁派（即黄教）传入蒙古，也无疑是真实的历史。

十六世纪中叶，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势力从河套一带扩张到甘、青地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阿勒坦汗的侄孙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1540~1586年）进军西藏地区，战争胜利后，他将一些西藏喇嘛带回蒙古。据哲里木盟库伦旗发现的《锡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记载，青海阿木多地方的阿兴（又名希日巴）喇嘛，先到五台山朝佛，后于1571年到长城以北的蒙古土默特部，会见了阿勒坦汗，解说佛教宗旨，缕述历代西藏高僧的学识与贤明以及生平等等，并劝说阿勒坦汗邀请格鲁派领袖索

南嘉措。另外,1576年,鄂尔多斯部的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洪台吉为蒙古贵族的一种称号)向他的叔父阿勒坦汗建议,迎请西藏达赖喇嘛,接受新教,以效忽必烈汗尊崇八思巴喇嘛之例,确立政教合一管理体制。阿勒坦汗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建议。经过阿兴喇嘛的传法以及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建议,阿勒坦汗有了皈依佛教的心愿。这两件事是阿勒坦汗迎佛的前奏,也是在这一段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 在青海高原上的会见

1578年5月18日，阿勒坦汗与西藏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1543～1588年）在青海湖东南岸由阿勒坦汗为迎请索南嘉措而修建的察布恰勒庙（仰华寺）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阿勒坦汗在仰华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据说，从远道前来参加欢迎大会的蒙、藏、汉、维吾尔等族僧众和军民达十万余人，真可谓盛况空前。我们从思想和宗教观点来看，在这次欢迎会上尤为重要的是由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所发表的一篇言辞生动的“讲演”

和所宣布制定的《十善福法规》。“讲演”对阿勒坦汗接受佛教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一举动是巩固汗权、建立和平、安宁的重要手段；“讲演”追述了宗王阔端、萨迦班智达以及忽必烈、八思巴等人兴教隆法的历史及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以后蒙古社会的混乱情形。从这篇“讲演”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蒙古人是如何厌战、热望和平的情形。这种热切盼望和平的心理，正是佛教得以顺利地蒙古宏法的基本要素。“讲演”对蒙古佛教史的主要阶段有十分明确的看法，认为第一阶段为忽必烈汗时期，第二阶段始于阿勒坦汗时期，即宗教和国家在蒙古的复兴阶段。这篇“讲演”，对于了解蒙古佛教史及其主要历史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欢迎会上，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还代表蒙古政界宣读了《十善福法规》，其主要宗旨是将佛教定为正式国教，巩固其地位，并制定了一些具体规定：如提出废除杀生祭祀和废除供奉“翁衮”之神（翁衮即萨满偶像），还废除古时在有人逝世时，其亲人、随从都要殉葬的习俗等等。这表明《十善福法规》的主要目的是根除蒙古固有的萨满教。从此，这部《十善福法规》便成为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后在蒙古确立和巩固的重要规则了。随着《十善福法规》的宣布，蒙古正式接受了藏传佛教的一支格鲁派的教义，同时也使中断了二百余年的蒙藏关系重新开始恢复。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文献学角度对“讲演”和

《十善福法规》略述几句。关于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讲演”最初见于蒙文史料《蒙古源流》(清代蒙古人萨囊彻辰著)诸抄本中,德国海涅什教授在柏林刊布影印本可说是流传至今并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本子。关于《十善福法规》,流传至今的权威性本子有如下几部:最早记载为西藏方面的资料即五世达赖所著的《达赖三世传》(1646年);其后是《蒙古源流》(1662);还有一个本子收在清人纳塔著的《金鬘》(今有乔吉校注本)其中《蒙古源流》所载《十善福法规》是萨氏摘引的,不完整,甚至还有一些地方不准确。《金鬘》所载虽然晚于前一部书,但其记载来自《达赖三世传》比起《蒙古源流》内容更为全面。看来,过去有人仅据《蒙古源流》的记载评论《十善福法规》显然是不足的。若要全面评论,必须要看藏文资料的记载和纳塔在《金鬘》中所记的蒙文内容。

有必要指出,利用宗教达到某一政治目的,是一切权势者丝毫不能忽略,也似乎不能动摇的举措。西藏佛教领袖应邀而来蒙古地方传法,而蒙古的政治领袖皈依西藏佛教,看起来似乎是顺理成章,其实,双方的这一举动,都包含着决策性的,甚至带有借助对方的权势,欲图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这大概才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这些,在这次会见或是会谈中,也看得出来:西藏佛教领袖将阿勒坦汗称作忽必烈的化身,赠给他“转千金法轮咱克

喇瓦尔迪彻辰汗”的称号。这对于阿勒坦汗来说，借助西藏宗教领袖的神力护持，加强了他在蒙古诸部中的号召力。阿勒坦汗将索南嘉措称作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的化身，赠给他“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这对于索南嘉措来说，由他领导的宗派，在蒙古大檀越（大施主）阿勒坦汗的全力支持下，加强了他在西藏诸宗派中的领导地位。

阿勒坦汗的皈依，使西藏佛教的一支格鲁派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当时土默特部的首府呼和浩特（明代称“归化城”）得到了蓬勃发展。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的会见结束后，达赖喇嘛自青海返回西藏之时，就指派了洞阔尔·满珠什里·呼图克图代表自己驻锡于呼和浩特，弘扬佛法。这样西藏宗教领袖的代表人物在呼和浩特主持了宗教事务。阿勒坦汗从青海返回呼和浩特后，即建造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大召（即弘慈寺），成为在内蒙古地区所建立的第一座藏佛教寺庙。此后数十年间，在阿勒坦汗的儿子、孙子及其亲信们的资助下，在呼和浩特及其附近，寺庙建筑相继而起，成为召庙林立、金壁辉煌的美丽城市，甚至到了明末清初，连“呼和浩特”这个地名也往往被“召城”一名所代替。云游僧侣、隐修士及其弟子、信徒不断集中到呼和浩特及其附近的一些山区。蒙古诸部的领袖人物也亲至呼和浩特拜佛，行皈依之礼。这样，在数十年间，呼和浩特就变成了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大本营了。

## 黄金家族出身的 达赖喇嘛

1582年，年初，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逝世。1586年西藏三世达赖喇嘛应阿勒坦汗之子僧格杜棱汗的邀请又亲自来到蒙古右翼三万户之地（今鄂尔多斯，土默特一带）传法。1588年，三世达赖在传法途中于喀喇沁万户的名为吉噶苏台（今内蒙古正兰旗境内）之地圆寂。他的“转世”生于阿勒坦汗家族中。这就是历辈达赖喇嘛中惟一的不是出身于藏族，而是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的第四世达赖喇嘛。

四世达赖喇嘛于 1589 年转生于

阿勒坦汗曾孙僧格杜棱汗之子，松布尔彻辰·楚库尔台吉家中。母名毕格楚克比吉。三岁时，西藏三大寺派来以巴勒母嘉措为首的高僧，确认他为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的“灵童”命名为云丹嘉措。

1602年，西藏三大寺派人来迎请，内蒙古军队护送入藏。1603年，在藏北热振寺举行了坐床典礼。然后接到哲蚌寺居住学经，由甘丹池巴·根敦坚赞授戒出家。1607年云丹嘉措赴札什伦布寺当时四世班禅罗桑曲结（1567～1662年）任池巴。云丹嘉措在那里居住了一个时期，向四世班禅求法，感情甚恰。1614年，云丹嘉措邀请四世班禅前往哲蚌寺，拜四世班禅为师，受了比丘戒。接着，云丹嘉措应哲蚌寺僧众的请求，继任了哲蚌寺第十三任池巴，又应色拉寺僧众之请，兼任了色拉寺第十五任池巴。

1616年旧历12月15日云丹嘉措在哲蚌寺圆寂时年28岁。

## 在内蒙古传教 的著名高僧

到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内蒙古诸部封建领主们完全向藏传佛教开放了。此时由西藏前来内蒙古地区弘法的大师们的布道活动，对藏佛教在蒙古地区深入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作用。其势可谓“六字真言”震撼漠南蒙古的程度。

### 阿兴喇嘛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阿兴（？~1636年）喇嘛，可以说是在阿勒坦汗时期从西藏来的第一位传法大师。据

《锡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齐格齐汉译)记载阿兴喇嘛出生于青海阿木多地方的萨木鲁家族,名希日巴,少时出家,曾于哲蚌寺学经。有人说,因他是达赖喇嘛母亲的同族近支,故被尊称为阿兴喇嘛。其实西藏史书称他为“佐格阿兴”;“佐格”是他出生的地名。学成后,离藏云游山西五台山。后转到长城以北的蒙古土默特部,居呼和浩特迤北之察罕哈达说教传法,深受阿勒坦汗的崇信。此后奉阿勒坦汗之命赴西藏迎请三世达赖,于丁丑年(1577年)返回呼和浩特,受封“额齐克喇嘛”之号。阿勒坦汗逝世后,约十七世纪初,阿兴喇嘛东游到喀喇沁、巴林等地区传教。己巳年(1629年)应后金皇太极之请入居盛京(今沈阳市),建言征伐明朝方略。后返回蒙古地方居于盛京之西法库山(约于1632年)次年迁居今内蒙古库伦旗其地始有“满珠锡里库伦”之称。未几于丙子年(1636年)八月十五日圆寂,寿八十余。

### 洞阔尔·满珠锡里·呼图克图

此外,随同阿勒坦汗从青海来呼和浩特的洞阔尔·满珠锡里·呼图克图(1557~1587年)是一位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这位活佛,不仅作为呼和浩特阿勒坦汗的喇嘛而闻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藏传佛教在土默特地区产生危机时,他挽救了这一危机,从而使佛教在整个蒙古地区迅速发展。据说

当阿勒坦汗的生命垂危之时，土默特部的领袖们对佛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甚至提出“此经教之益安在哉？既无益于合罕之金命，岂能利后世之他人乎！此等喇嘛乃欺诳者也，今当弃绝此辈僧徒”的想法。满珠锡里·呼图克图闻之，立即到现场用佛法之生死轮回之道说服和扭转了土默特部的领袖们在取舍佛教的歧途上的彷徨。看来，这一关键时刻，满珠锡里·呼图克图做了扭转乾坤的大事。

### 锡埒图·固什·绰尔济

当时从西藏前来弘扬佛法的诸大师中，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活动，对蒙古人接受佛教思想具有很大影响。从蒙文方面的资料记载来看，他的传教活动，从阿勒坦汗时期开始，到那木岱汗略后的年代中，均依稀可见。他不仅是三世达赖之高徒，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他是这一时期的最负盛名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他除了参加那木岱时期所进行的《甘珠尔》经的翻译及领导工作而外，还把许多其它极为重要的佛教经典译成蒙古文。他作为一名传法者，在其众多佛经的“译后记”和有关著作里，向广大佛教徒系统地介绍了教徒必须了解的佛教教义、伦理道德和佛教历史。我们知道，接受一种宗教，就要接受那个宗教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传法活动，对于用佛教的基

本思想观念统治蒙古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远远超出了他的同行们。他的代表作《本义必用经》在蒙古社会中颇有影响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 其他弘法者

除了上述几位重要的传法者而外，还有几位传法者的活动也被记载在蒙文的佛教文献中。如：参加阿勒坦汗时期所建大召开光活动的济陇·呼图克图·拉汪曲结坚赞（1537～1604年）依四世达赖的派遣而前来呼和浩特统掌佛法的迈达哩·呼图克图（1592～？年）出自西蒙古贵族家庭，受西藏格鲁派领袖的派遣而来呼和浩特，后来又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内齐·托因（1557～1653年）；在蒙古末代汗—林丹汗的宫帐里当宗教顾问的沙尔巴·呼图克图；在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上传教，后来得到满族皇室优礼的斡禄达尔罕囊索（？～1621年）等等。在当时除了西藏的大师们来弘法以外，在呼和浩特地区还有一些蒙古族出身的大师也在进行传法活动，如呼和浩特的博格达察罕喇嘛（？～1627年）当时就在呼和浩特一带传法，并且他的活动很有影响。上述这些传法大师，都是阿勒坦汗皈依佛教后，使内蒙古地区的佛教大兴的主要弘法者。他们的传法活动，都是先从内蒙古封建上层开始，随后逐渐普及于民间。

## 佛教向东传播 萨满遭到镇压

十六世纪末，藏传佛教除了在内蒙古地区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发展而外，还继续向内蒙古东部地区发展。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十六世纪中叶，蒙古左翼三万户中的察哈尔万户和喀尔喀万户在达赖孙库登汗（1548～1557年）的统率下向东方迁移，其游牧范围，从明代的宣化府边境地区（今内蒙古多伦县一带）一直到达辽河地区，今天的科尔沁草原成了其统治下的新领地。达赖孙库登汗是否受到西藏佛教的影响，从文献上我们找不出一一点凭证来。但是到了他

的儿子、在蒙古史上赫赫有名的图们札萨克图汗（1557～1592年）皈依佛教之事，蒙文文献都有所记载。当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邀请西藏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之际，图们札萨克图汗也于1557年邀请当时西藏的噶玛派的法主，并以弟子和门徒的身份朝拜他，进而皈依该宗，并在自己的属民中进行传播。我们知道，在蒙古汗国时期至元朝一代，西藏噶玛派的法主们虽然未能取得萨迦派那样领导全国佛教之地位，但也深得蒙古汗们的敬重。我们根据《蒙古源流》等蒙文文献的记载，发现在这个时期，西藏佛教的格鲁派与噶玛派显然都得到过蒙古封建领主们的支持这一事实。由此可以推断，蒙古贵族们在十六世纪后半期接受藏传佛教之时，西藏的噶玛派与格鲁派（即改革派）都同时争取对蒙古传法的机会和蒙古封建领主们的支持和资助。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图们札萨克图汗虽与噶玛派取得了联系，但同时又考虑到当时格鲁派的势力和影响也很大，所以他必须考虑与格鲁派的领袖三世达赖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于是，阿勒坦汗逝世后，他曾两次派遣使臣邀请过三世达赖到他的领地。三世达赖虽然第二次接受了邀请，并准备东行，但不幸的是因为他于1588年圆寂而未能实现。看起来，图们札萨克图汗虽然是由噶玛派的法主引导而入法门，但并不因此而完全变成噶玛派的支持者。对于正在兴盛的格鲁派他还是有着极大的敬仰。西藏佛